

易经与孔子的蝉蜕龙变

谢宝笙 著



易经与孔子的蝉蜕龙变

谢宝笙 著

华 夏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易经与孔子的蝉蜕龙变/谢宝笙.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5. 5

ISBN 7-5080-0798-0

I. 易… II. 谢… III. ①孔丘—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②周易—对比研究—论语 IV. B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1740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1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137千字

1995年5月北京第1版 199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9.80元

导言——非常现实的民族文化观

经过长年的研究，激烈的争论，再加上不断丰富的出土文物证据，《易经》的原著精神以及孔子与《易经》的关系终于能大白于天下。

《易经》上半部分是以占筮格式填写出来的武王伐纣历史，书的下半部分是作者自传。作者名叫南宫括，是周文王和周武王时代的开国功臣。作者是在周武王病危时完成《易经》的，目的是以哲理形式总结周克殷的经验，告诫周族新一代以巩固新建立的政权。为了使哲理带有更普遍的意义，他尽量少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称谓。

《易经》完成后，刚好遇上三监之乱，没有达到原先的目的，只能存放在周朝的藏书阁中，一放就是五百多年。直至春秋时代，周天子王权衰落，史官和一些官员从朝廷取出大量珍贵的文献，送给各个诸侯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易经》重见天日。

《易经》“重出江湖”，已经与世隔绝了五百多年。因为它是一本以占筮格式写成的历史哲理，没有具体的日期和名称，人们就将它视为占筮用书。

史官们从藏书阁取出《易经》的同时，亦带出一些与《易经》写作背景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绝大部分已经在项羽火烧咸阳城时毁去。

孔子是东周时代的人，他当然可以看到和《易经》写作有关的第一手材料。孔子的年代和西周相距不远，他完全能直接看懂

《易经》原文的文字。孔子对《易经》的了解，极可能就是最接近原著精神的理解。孔子之后，大多数学者都接受《易经》是一本出色的古代哲学著作，而不是一本占筮的书。往后，越来越多人对《易经》进行哲理的研究。可是在秦朝之后，因大量关于孔子研《易》的资料已经丧失，汉朝人又大量地利用《易经》作为占筮迷信活动之用，有关《易经》的研究，就成为如何发展占筮方法的神秘理论。

孔子晚年花大量时间研究《易经》，甚至达到“在家的時候，將《易经》放在床上，外出時，放在布袋中隨身攜帶”的地步，以至將竹簡的繩子弄斷了多次。將馬王堆出土文物帛書《要》和解釋《易经》的《易傳》中孔子的原話對照，就會發覺，孔子已經掌握了《易经》的寫作背景、原著精神和中心易理。看來，他還將和《易经》有關的資料整理好，留傳於世。另一方面，學《易》的弟子將孔子講解《易经》的談話記錄下來；這些都是非常珍貴的文化財產。孔子在研究《易经》之前，對道家所喜談的“天道”——宇宙最高法則，並沒有什麼興趣。他前期的思想主要是集中對所謂“人道”——社會倫理法則的研究，這反映在《論語》上。孔子前期的弟子並不理解他晚年沉迷《易经》的原因，很少有再跟他重頭學《易经》的。於是孔子的思想就分為兩個時期；他的學生也分為兩派。

孔子晚年易學派弟子中有一個叫商瞿的，他將孔子的易學傳給馯臂子弘，再經七傳至司馬遷父子。馯臂子弘是楚國人，他極可能是將孔子易學遺產整理成為早期《易傳》的人，並親自寫了其中主要的幾篇。《系辭傳》是《易傳》中最重要的一篇，此篇文章的成書年代相當接近他的活動年代。孔子的易學弟子可能有多个，傳《易》系統也有几个。但是《系辭傳》的作者那一系，就成為最著名的一系，那就是司馬遷記述的一系。

在《易傳》中，特別是有“子曰”的部分，和馬王堆帛書比較，可以證實是孔子與弟子談易的記錄。這些記錄反映了孔子的易

学观，其余主要的是骀臂子弘的思想。《易传》中的“爻位说”是《易传》的主导思想，是骀臂子弘的伟大发明。这是一个应用易理和演绎易理的伟大发明，却不是对原精神的恢复，又不是孔子的“简易的变易”易学观。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爻位说一方面能较有说服力地全面解说经文，另一方面创造了一个结构严密的“阴阳模型哲学”。这有利于进一步扫清利用《易经》占筮的观点，更有利于将易理直接应用于各门学科之中。爻位说二千多年来进一步发展得异常复杂。如果将这个学说作为追寻《易经》哲学原意的途径，就会将易学变成繁琐哲学，使《易经》成为世上最难读的书。恢复孔子的易学观，绕过这个繁琐的爻位说，就能找到《易经》原著的“简易之变易”精神，从而能真正读懂原文那四千九百多字。这个精神之恢复，也是对孔子晚年思想的恢复，使孔子的思想能跟上时代，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化路途中的一个特别的指南。

二

除了一些非常固守自己观点的人外，绝大多数人对外族文化和自己民族文化的观感都是非常现实的。那一个民族国力强大，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容易被其它民族所认同。认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通过学术的分析，而主要是依靠群体感觉来决定。只要那个民族的生活看起来令人羡慕，那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被人向往的对象。

于是，殖民主义者虽然对被压迫者非常不人道，殖民地的人们却认同着统治者的文化。无论西方列强怎样欺负我们，中国人也非常崇尚西方文化。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总是希望能通过不停地增强西化的幅度，来振兴中华。

于是，一部分现代中国人对培育着我们祖先几千年的文化，总是抱着怨恨的态度。

当亚洲四小龙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后，令人痛心的情况开

始物极而反。亚洲这四个面积窄小而经济能力强劲的地区，令先进的西方人也为之吃惊。吃惊之余，就极力去寻找起飞的内部原因。那个现实的民族文化观在此又起了强大的作用，人们马上觉得，中国文化可能是创造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鉴于当时否定孔子的中国大陆，经济还是乏善可陈的，学术界进一步提出，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文化，才是促进这些地区经济起飞的因素。本世纪初，中国人急于抛弃的孔学和儒学，今天在全世界突然变得“吃香”起来。

如果说，在中国文化发翔地的大陆经济还未起飞，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还热不起来的话；那么当中国经济展翅高飞，中国文化必然会以逐步升温的热浪，迫向并沸腾着世界。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越来越不需要通过艰苦而繁琐，甚至低调的方式加以说明。

作为早期就开始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们，相信不会忘记那漫步如铁的岁月。当你很高兴地发现一些精采的哲理，提供给以西方思维方式的“专家”鉴证时，每一次遇到的都是非常苛刻的“专业语言”。如果你要说明一些哲理可以在科学研究中启发灵感的话，你首先要成为一个专家。在这个地球上，谁也没有可能首先完成各门科学的研究，才从那里抽象出和现代科学相符合的普遍哲理。中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谈话，常是以领取一顶“科学知识不专业”的帽子告终。老子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不是可以在那里实现吗？（其中一些肯耐心作出解说的科学家，确是真正的朋友）

学术上似乎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现在却借由经济发展形势轻易地完成了。当那向往中国文化的时代来临时，宣扬中国文化的工作，几乎只需要集中在对中国文化内部的整理之内。

事实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非常有价值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面积和人口极庞大的民族演化出来的文化，根本不需要由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来评价。如果

必须由西方来评价，恐怕永远只是一个不平等的评价。

现在，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觉得意义重大。我们越来越会觉得，研究的成果将不用担心它们的“市场价值”。反之，不断发展的中国经济形势，将会帮助我们扫清那些不平等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念。那些真正能发掘出传统文化精粹的工作，本身将会被证明是有价值的工作，而不需要等待人家的承认才能“推出市场”。这种文化精粹必然会对世界不同种族的人的人生观、工作方法、思考方法以至处理生活事务，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

轻视民族文化的观念来源于近一百多年来的民族积弱。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打破落后于世界的古老封建意识，引进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促进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运动。可是在巨大的成就下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在这个运动之后，几乎所有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文化资料都要接受重新的检查。在苛刻的检查中一旦发现有什么疑点，就会被全盘地否认。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自然首当其冲。“孔家店必须被打倒”，孔子及其弟子们共同作的《易传》，轻易地被否定。《易经》经过“简易的司法程序”被裁定是占卜迷信的记录，里面当然没有什么高超的哲学。同期被判刑的还有大量的古代传统文献，例如：三黄、五帝，以至夏代的历史被“证明”是一个精心编造的历史。大量古籍被“证明”是伪造的文件。整个中国文化于是陷于支离破碎的境地，热爱传统文化的人非常痛心，那些“勇士们”对“道统”的困境却感到非常满意。越到后来，越发觉这种过份否定古代文化的倾向是有问题的。人们终于开始重新审定这些“冤案”。可是重审的速度仍然非常缓慢，大量的受害者仍然长期地等待着“平反”。

古代文化在几千年中，原来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怀疑。可是

“运动”一来，统统要接受起诉。现在虽然要给它们恢复名誉，可是平反审理却要经过非常苛刻的检验。这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依照西方的标准来检验，进度当然非常缓慢。不过那些能通过严格鉴证的东西从此就有极高的可靠性。在这个极严格的要求下，《易经》和孔子的问题终于能较早地得以澄清。

一九七三年在湖南省长沙出土了大量汉初时期的文物。其中有多篇有关《易经》、《易传》和孔子研究《易经》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加上其它有关的文物资料，以及近年来在这方面丰富的研究成果，就能顺利地恢复历史原来的面目。

恢复工作的故事是这样的：首先是近年出现的《易经》热，研究《易经》的人不但遍布全国，而且在海峡两岸，新、港、日、韩以至世界各地。易学会议多不胜数，易学著作每星期出版超过一本。在这个超级庞大的研究队伍中，出色的成就不断涌现出来，《易经》原著精神面目，一天比一天接近重现的日子。

其实全面复原《易经》密码的逻辑是很简单的。《易经》全书结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立体对称结构。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两经，第一、二两卦[乾][坤]是全书的总纲，最后两卦[既济]和[未济]是全书的总结。上经对称下经，[乾]卦对称[坤]卦，这是横的对称；[乾]卦对称上经，是上经的大纲，[坤]卦对称下经，是下经的大纲，这是纵的对称。[乾]卦是为君之道，对应上经是周克殷的历史哲学；[坤]卦是为臣之道，对应下经的作者自传。书中有大量的比喻，但都是非常对称的。凡是单数的卦如第一、三、五、七……至六十三卦都和相数的卦对称；其卦画的形状不是倒转就是阴阳相反。卦中的内容大多是一些相反相承的历史片断和历史哲理的描述。再加上经文中有大量相反相承的用字，从中就可以顺利地找出解开全书的密码，复原全部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是严格依照时间的顺序而编成的，可以简单地和周克殷的历史对照。至此《易经》之谜就全面地被打开了。这是一个思路的简介，至于全面而严格的论证，在正文内和附录中有详细的介

绍。那些有兴趣寻根究底的读者，可以参考拙作《易经之谜是如何打开的》。

几乎在《易经》之谜打开的同时，公布了二十年前出土的马王堆珍贵文物。这些文物是入土于二千年前，其材料是出于战国时代，是独尊儒家前的文物，对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证明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其中有几篇关于《易经》、《易传》和孔子研究《易经》的资料，从实物的角度证明了《易经》的谜底之可靠性。这些材料同时证明孔子晚年是专门对《易经》作过详细的研究，并且引起前期弟子的不安。这一发现解答了无数的关于孔子研《易》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孔子会对一本“卜筮”之书进行研究呢？孔子在《论语》中从来不语怪力神，为什么到晚年忽然强调学《易》的重要性？为什么他的再传弟子都绝不称引《周易》呢？为什么孟子不提《易经》呢？为什么在早期的“五艺”中独缺《易》呢？为什么《易传》中有大量和孔子基本观点相反的言论呢？诸如此类，如果没有这些出土文物，恐怕连支持孔子曾研《易》的学者，也不能解答以上的疑问，这个千古奇案恐怕永难平反。“上天”似乎不再折磨这饱受肢解之苦的中国文化，赐给我们这些求之不得的宝物。不过这些宝贝出土之后，整整要经过二十年才能全部发表，不少一生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都已经等待不及，没有机会看到真相了。

这些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一篇名叫《要》，里面有大量关于孔子与《易经》的资料。可以这样说，近百年来不少悬案都在这里 有答案。所以关于这篇文章的可靠性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自然它又要面对是否又是“假造的文件”的质疑。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对该文作了非常详细、非常有说服力的研究报告——《帛书〈要〉试释》，我自己在打开《易经》之谜的基础上从另一个角度再作了一些证明。但是这篇文章的真确性实在是太事关重大了，将其它推论都放在一篇文章中是不智的。为了谨而慎之，为了保证能通过怀疑主义者的审问，我尽量将该文的资料作为问题解决的

指南或启示。问题的解决，还是要从问题的内部中寻找足够的证据。不过，在应用《要》篇的资料说明问题时，例如和《易传》中孔子的原话相对照时，会产生互相引证、相辅相承的效应。如果《要》篇中孔子的易学观竟然和《易传》中“子曰”的观点完全等同，问题就不用多说了。

最后一步是在《易传》中整理出和孔子易学观相违反的部分，这就是“爻位说”。然后发觉这是主导着《易传》其它非孔子易学观的部分。这个观点极可能是出于一人之手，孔子和他的再传弟子的易学观，以及日后易学发展的主流倾向就能整理出来。

本书尽可能以通俗的语言介绍这个发现，因为大部分人是不能精通易学各个分科的，同时对《易经》不熟识的人也可以参与讨论，从常识和简单的逻辑出发，鉴证这一个新的观点的可信性。

目 录

导 言	非常现实的民族文化观	(1)
第一章	学术理性中的感情	(1)
第二章	《易经》产生的背景	(4)
第三章	孔子与《易经》的故事	(19)
第四章	《易经》之谜真的打开了吗?	(28)
第五章	从《要》篇和《易传》的对比中复原 孔子的易学观	(47)
第六章	《易传》中非孔子的易学观	(58)
第七章	《论语》中孔子思想的分期	(66)
第八章	《易经》卦爻辞的论证和白话解说	(74)
附录一	马王堆《要》篇原文	(170)
附录二	《要》篇通俗白话译文	(172)
附录三	马王堆帛书《周易》“軀”字揭秘	(176)

第一章 学术理性中的感情

司马迁在完结关于孔子生平的叙述时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我在翻读孔子与《易经》的关系的资料时，有数次好像见到其人，当时在脑海中好像听到一些声音：“这不是我原来的观点”。

我中小学是在基督教学校念书的，亲戚朋友中亦有不少教友，因此我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圣经的道理。没想到这些道理原来是西方文化中最接近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或许是这个原因，使我初次看到孔子的书时，并不感到陌生，丝毫没有鄙视的念头。这原来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可是几年后的“批孔运动”，我终于正式加入“批判”的行列。

批判孔子是一件非常容易办的事。孔子固然不会为自己的见解辩护，在这高度西化的香港社会，挺身而出“捍卫”孔子名誉的人，寥寥无几。所以随着“群众”声势，心里说一声“否定”，孔子在脑海中就被彻底地否定了。

其实，“孔家店”在本世纪初，在中国早已被打倒了。如今我们这些小伙子所做的，是再一次投以鄙视的眼光罢了。但我们却不知道，在地球的另一边，孔子的地位又在西方人的心目中静静地被树立起来。追求全面西化的人，竟然在西方社会找到自己早期所鄙视的东西，心情自然非常矛盾。不过大多数“忠诚”西化的人，不会为这个矛盾所困扰，很快，他们就开始尊孔起来。

我再次大量接触孔子的学说，是在研究《易经》的时候。研究《易经》不得不大量读《易传》。《易传》或叫《十翼》，是公认的孔子或其弟子对《易经》原文的十篇权威解说。不过当时我的观点是：

孔子距离《易经》写作的年代最少有五百多年，孔子似乎没有掌握《易经》卦爻辞的历史意义，他只不过是借题发挥自己的学说而已。要打开《易经》之谜，就要大胆地绕过《易传》这个二千年权威之说。《易经》之谜之所以能延续三千年，而且易学有越来越繁琐的倾向，其根本原因就是人们不能摆脱《易传》的误导。在易学似乎陷入困境，似乎永远不能解开这个谜之际，摆脱《易传》的误导，应该是唯一的摆脱困境的方法。

学术研究以及新观点之发现，往往离不开尝试走一些似乎走不通的路，再加上一点运气。很幸运，这个尝试并没有投错，武王伐纣哲学这个原著精神，终于被发掘出来。虽然如此，我对孔子的印象却开始深刻起来。

人是感情的动物，无论在学术研究中，如何克制自己的感情，在空余时间中，却不能避免不自觉地对历史人物产生奇怪的感觉。

我记得在一九九二年在香港举办的一次孔子展览，我怀着寻找进一步否定孔子与《易经》原著精神的证据的心情参观了那次展览。照习惯，先跟着讲解员细心地听解说。想不到那位年轻的小姐不但介绍得非常精采，而且对孔夫子充满尊敬之情。当她讲到在元朝和清朝“外族”入侵的年代，那些亡国政府都如花一样无可奈何的落去，孔子的地位却依然不倒。虽然有人说，这是“胡人”利用孔子来麻醉汉人的思想，我当时不是这样想的。在老百姓都不介意那些汉族统治者被铲除的时候，人们却监察着“胡人”有没有藉着铲除孔子来铲除中华文化。孔子思想怎么会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至此表露无遗。在这一刹那间，我的心被巨然震动了一下，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尊敬之心由此而生。

一九九三年，我有机会参加山东省济南市举办的第一届“海峡两岸易学研讨会”。会议期间，有机会到孔子的故乡曲阜参观。去之前我也准备了一份“朝圣”的心情，可是到了孔府之后，因为行程紧迫，再加上忙于和朋友们讨论易学问题，这次参观就在匆

中结束。不过，这丝毫没有妨碍我对孔子的感情之增进。

回来后，我开始写孔子与《易经》一书。但是每当我翻读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时，都强烈地感染上司马迁对孔子的感情。尤其是读到孔子病危时，盼望着子贡早点回来见他。当子贡赶到后，孔子对他说：“子贡！你为什么来得这样迟呢？”孔子死后，子贡在孔子墓旁建了一所简单的小房子，为老师守墓六年。子贡后来成为大官大商人，与各国诸侯“分庭抗礼”，影响了吴越斗争之形势。子贡为孔子守墓的房子，我在参观孔庙时是看见过的，当时并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我看到马王堆帛书《要》篇，里面有孔子和子贡争论研究《易经》有什么意义时，老师和学生发生了一次非常激烈的交锋，于是我开始了对子贡的研究。所以每当我读到孔子盼望子贡快点回来见他最后一面时，都产生不能抑制的激动心情。

第二章 《易经》产生的背景

《易经》是周朝初年的作品。对《易经》本文取得充分认识后，就可以进一步认识五百年后，孔子和弟子们对它作出解释的《易传》。从这里出发，又可以上溯《易经》之前商朝的哲学。

《易经》之前是商朝，商朝之前是夏朝，夏朝之前，中国并没有正式的朝代。夏朝之前是所谓三皇五帝年代。五帝之首是黄帝，黄帝之前是三皇：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这已经是中国历史传说故事的起始。

产生《易经》的周朝，是一个真正普遍运用文字写作的年代。在此之前的商朝，并没有为后世留下可信的文献。《尚书》中的《商书》，是经周朝的史官整理出来的文件。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怀疑商朝是否有可信的历史。直至数十万甲骨文的出土，证明史记中关于商朝，特别是商朝世系的记载是可靠的。中国的信史于是推前至商朝。

商朝之前是夏朝。在疑古风气流行的年代，夏朝曾否存在过，也是在被怀疑之列。直至1959年在今河南偃师西南二里头发掘出一文化遗址，相信那就是属于夏文化。古代对于夏朝虽然有不少系统的记载，可是，今天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对此作出可靠的证明。夏朝虽然是中国皇朝的真正的开始，治水的夏禹相传是第一位开创世袭皇帝制度的人，因为欠缺可靠的证据，一切都和三皇五帝一样，被列入传说时代。

关于夏朝的传说虽然还未能得到证实，但历史故事及其世系次序，还是比较清楚的。至于五帝，就是传说本身，其事件的顺序也呈现混乱，甚至达到互相矛盾的状态。虽然如此，关于黄帝、

炎帝、尧帝和舜帝的个人事迹的传说，却非常丰富。根据这些不同版本的传说，也许可以整理出一些可信性较高的历史事件来。

至于三皇时代，那几乎是传说的末端，谁先谁后，是否真有其人，连传说者也不那么肯定。关于他们的传说，大多是有关宏观的历史性发明，没有明显的个人事迹，没有传人或子孙的故事，也没有清楚的战斗故事，相信它们只是文化发展阶段的代名词而已。可是其中的伏羲氏，却是易学中最关重要的一环。

外国人常常认为伏羲是中国最早的王，是中国历史的开端。在《易传》中，有一段话是说伏羲如何作八卦，《易经》的产生年代和中国历史传说的末端连在一起，《易经》就被视为中华民族开族的天书。

基于以前人们对《易经》的经文内容不能有确定的解释，无人首先作八卦的问题是不可能合理的猜想。《易经》之谜打开之后，对这个问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现在先看看周朝初年《易经》产生的经过。

前面说到，周朝之前的商朝，虽然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文字，并且有很高的哲学和文化，但是商朝人是不习惯用文字记录他们的事迹的。现今所看见的甲骨文，只是占卜和迷信活动的记录。商朝已经懂得用青铜制作器具，并且还在这些青铜器上写上文字，但是这些文字，极少有对他们的历史作出正面的说明。原因是商朝的人还没有对文章所起的作用有适当的认识。我们只能根据周公在《尚书》中说过，商人“有典有册”，而推断商朝的极少部分史官曾经用文字记载过他们的历史。反之周朝一开国，就大量运用文字详细记录他们的言行。

周朝的文化是紧接商朝而发展的，其中一些开国功臣还是从商朝投奔过来的。为什么周朝的文化会突然产生一个飞跃呢？这完全由于周朝的开国，是经过一次极其精采的革命。这次革命不但带来商朝的灭亡，而且带来全新的思维方式。首先是迷信文化的大幅度衰落，哲学文化的突然兴起。周人以弱小的国力打败